



20 世纪 90 年代东亚经济崛起对日本经济的冲击

刘自强

摘要: 国际经济竞争关乎国家兴衰。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东亚的“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通过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相继实现了经济起飞。到 90 年代,日本在外贸、投资和金融等领域面临中韩等国的激烈竞争。随着中韩等国产业竞争力的凸显,日本在东亚精心构筑的“雁行模式”开始解体,在东亚和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急剧下降。在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日本也面临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严峻挑战。因而,东亚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90 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

关键词: 东亚经济崛起; 国际经济竞争; 日本; 经济衰退

二战结束后,东亚^①曾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之一”^②。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东亚地区的“四小龙”^③、东盟和中国,先后通过融入世界体系,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相继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现代后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奇迹。到 90 年代初期,东亚已经和西欧、北美媲美成为全球三大生产贸易中心,成为“世界最大的为国际投资提供储蓄余额的来源地以及世界最贪婪的食品与原材料进口地”^④。1993 年,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公共报告,对东亚奇迹予以肯定^⑤。1993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领袖峰会上声称,亚洲“经济奇迹”将催生一个“太平洋世纪”^⑥。

众所周知,东亚是继战后“日本奇迹”之后又一个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地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随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崛起,90 年代“日本奇迹”嘎然而止,陷入长期衰退之中。那么,东亚经济奇迹与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东亚经济崛起究竟在哪些方面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大多从日本内部分析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⑦,本文拟另辟蹊径,从东亚经济崛起的新视角来解读 90 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

① 本文中的“东亚”是指除日本以外的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以及中国等东北亚、东南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78 页。

③ “四小龙”指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四个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④ Ross Garnaut, *Open Regionalism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An Asia-Pacific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Trade Syste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6, p. 122.

⑤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

⑥ Thomas C. Fisch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llies or Adversaries?* Westport, Conn.: Quorum Books, 2000, p. 178.

⑦ 国内外学术界大多从日本内部分析 90 年代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参阅笔者《90 年代国际产业竞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10 年第 6 期,第 27 页脚注①。

一、东亚产业竞争力的崛起对日本外贸的挑战

东亚人口众多,资源富集,市场广阔。随着东亚经济快速崛起,东亚各国不仅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和先进技术来促进工业化,而且需要大量的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从而为日本提供了有利的贸易和投资场所。从另一方面看,东亚各国通过引进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发展起来的纺织、服装、玩具、造船、钢铁、机械、家用电器、钟表、电子、通讯乃至汽车工业等,到 90 年代,已经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尤其是中国利用世界第一人力资源大国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贸易,“将人口众多这一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①,迅速提升了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中国、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各国产业竞争力与日俱增,已成为日本产品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首先,中国产业竞争力迅速崛起给日本带来了严峻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急剧上升。中国占世界名义 GDP 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1.8% 上升到 1999 年的 3.4%。中国货物出口从 1990 年的 621 亿美元猛增到 2000 年的 2492 亿美元^②;中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份额从 1990 年的 1.8% 上升到 2000 年的 4%^③。由于中国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在国际市场上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生产的中低档产品价格物美,在欧美市场上很受欢迎,并对日本的同类产品构成威胁。从 1994 年开始,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已成为规模最大的出口商品。而 80 年代中期通过进口替代发展起来的家用电器产业(如洗衣机、彩色电视机、VCD 等),经过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以及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之后,到 90 年代中期前后在国际市场上质量上乘成本最低,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完全将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的组装货挤垮。“中国的主要家电厂家已经具备了开发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的技术”,不仅具备了世界首屈一指的价格竞争力,在技术方面也正在紧追日本厂家^④。长虹、海尔、宝钢、一汽等大中型企业经过兼并重组,进入世界 500 强。2002 年 8 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完成了对日本和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的报告《世界工厂——中国的跃进和实象》。根据该报告,在所调查的 15 个行业中,日本在价格和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均超过中国的,仅有汽车和信息技术设备这两个行业;在技术方面的竞争力超过中国的有造船、钢铁、化学等 13 个行业;但在价格竞争力方面被中国超过的有纤维、家用电器等 10 个行业。这充分说明,尽管日本的大多数产业在技术方面仍然保持竞争优势,但却被以低廉的人工成本为背景的中国产业的价格竞争力远远超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辜朝明所言,“通常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具有相同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日本因此受到的冲击要更加猛烈……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当日本经济身陷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苦苦挣扎时,中国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终日本发现自己面临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相同的局面,制造业大量移往中国,从 1994 年起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就一直处于逆差状态”^⑤。因此,中国的快速崛起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后以来的最大挑战。

其次,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崛起也对日本构成重大挑战。70 年代以来,东亚“四小龙”迅速崛起,经过 80 年代的全面发展,到 90 年代它们的产业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1985 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日元急剧升值,日本的生产成本迅速上升。日本国内制造业工人的月工资金额,比“四小龙”及东盟要高得多。1992 年,日本制造业工人工资分别是“四小龙”及东盟平均水平的 3 倍和 20 倍^⑥。因此,在生产成本方面,日本与“四小龙”及东盟相比,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上。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1996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新加坡名列第一,香港名列第二,日本则被排到了第十三位。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东盟各国的经济也相继崛起。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1996 年全球竞争力

①杨圣明:《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外发展》,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数据(2002 年)》,“货物出口总额(2002 年)”,载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2/t20040118_402193441.htm。

③JETRO. JETRO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Trade(2001)——World Trade Expands Broadly And China Rise to Prominence (Summary), p. 10, 载 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white_paper/。

④田中景:《日本经济:过去·现状·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第 172 页。

⑤辜朝明:《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第 153~154 页。

⑥林华生:《亚洲“四极”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第 17 页。

报告》中,马来西亚名列第十位,泰国紧随日本之后,名列第十四位。

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和贸易竞争力的迅速崛起,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开始面临东亚的严峻挑战。亚洲(除日本)的出口额,从1986年的2120亿美元急剧增加到了1993年的6410亿美元。到1993年,亚洲(除日本)的出口额是美国的140%,是日本的180%^①,光“四小龙”的出口额就超过日本。以对华贸易为例,1980—1985年期间,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在对华出口中占有优势地位。然而,“1985年以后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欧美国家大体上是停滞状态,而日本的份额则始终呈下降趋势。日本的份额被香港取而代之”^②。整个9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外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日本,韩国货物出口增长165.07%,香港增长145.62%,新加坡增长161.48%,泰国增长199.13%,印尼增长141.63%,马来西亚增长232.54%,菲律宾增长391.35%,印度增长135.55%,均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货物出口84.24%的平均增长率;而同期日本只增长66.62%^③。到2000年,该地区(不含日本)出口份额占全球出口的17%^④;而日本对外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则呈现急剧下降趋势,由1986年的最高值10.6%下降为2001年的6.6%^⑤。

不仅如此,随着东亚产业竞争优势的崛起,日本在东亚地区精心编织的“雁行模式”已难以为继。战后初期以来,日本吸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不断实行产业升级,“从纺织业开始升至化学工业,然后升至钢铁业,继升至汽车业,再升至电子、电气设备业。同时,日本将技术升级后淘汰的产业依次转移给四小龙、东盟、中国、越南和印度”^⑥。这样就形成了始终以日本为头雁的亚洲国际分工和地区经济合作,从而带动了“四小龙”的升级,以及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在80年代的出口导向型起飞。然而,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使“雁行模式”在东亚已难以为继。冷战结束后,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不遗余力地加大对信息产业等部门的投入和开发,并在高新技术领域采取充分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大量鼓励和吸收国外高科技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从而使东亚国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如航空、汽车、电子、通讯、计算机等方面发展很快,“雁行”队形已被打乱。在电脑和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美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印度等地建立了新型直接分工模式。台湾经济在90年代成功经历了两次产业结构升级,90年代初期升级到电脑及其周边产品,90年代中期以后升级到半导体、LCD等产品,直接与美国市场建立了联系。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台湾又将中低档电脑产品转移到中国大陆的东莞、上海等地。中国香港也远离了日本国际分工战略的雁群队形。“今天东南亚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已不再是日本全球科技大国的支柱,而成了日本的竞争对手。在电子软件生产方面对日本日益形成的竞争威胁不是来自美国和欧洲,而是来自本地区。”^⑦与此同时,90年代日本在电脑、电信和互联网的国际分工中,始终无法取得类似自己在六七十年代钢铁和家用电器、80年代汽车和半导体的全球领先地位。在90年代的电脑、电信等主流消费产品的国际分工中,日本基本没有介入进来,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技术输出和资金能力逐渐减弱。到90年代末期,在这一轮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中,日本明显失去了领先优势。日本经济产业省2001年发表的《通商白皮书》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解体,根源在于9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东亚各国积极利用外资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使东亚的分工体系发生根本改变,半导体、家电、计算机等制造业基础全面确立,成为世界重要的产品供给源,对日本形成水平分工态势。日本在东亚的头雁地位已不复存在^⑧。

①林华生:《亚洲“四极”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12~13页。

②林华生:《亚洲“四极”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16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数据(2002年)》,“货物出口总额(2002年)”。

④Ellis S. Krauss & T. J. Pempel. *Beyond Bilateralism: U. S. - 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

⑤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経済分析部:「日本の貿易動向(2005年)」,“表1-4 世界貿易に占める日本のシェア”,第15页。

⑥Robert Garran. *Tigers Tamed: the End of the Asian Mirac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p. 48~49.

⑦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中国铁道出版社1998年,第323页。

⑧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总论)》2001年,载 <http://www.meti.go.jp/report/tsuhaku/PDFsohron/soronPDF.htm>。

二、东亚国际投资的高涨对日本对外投资的挤压

80 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加之东亚国家和地区推出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从而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统计,1970—1979 年世界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只占 16.1%,而拉美占 53.7%,非洲占 14.7%。但 1980—1990 年间,东亚的比例上升为 33.2%,即翻了一番,而拉美降至 42%,非洲更跌至 6.7%^①。1980—1993 年,亚太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占世界的份额从 7%上升到 12%,占同期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份额从 30%上升到 49%^②。这说明从 80 年代开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心已转向东亚。不仅如此,整个 90 年代,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是国际投资角逐的热点地区。1991—1994 年,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升至 20%以上。1995 年,美国提出要重视世界十大新兴市场,其中有 3 个在东亚,即中国、韩国和东盟。欧洲国家也纷纷把东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标。1995 年公布的欧盟在亚洲的大型投资项目中主要分布在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东亚、南亚国家。欧洲委员会也陆续出台了“亚洲投资计划”(The Asia-Invest Programme)、“欧洲共同体投资合作伙伴计划”(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vestment Partners)、“欧洲投资银行融资计划”(Financing facilities of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等一系列计划支持对亚洲的投资。1996 年 3 月亚欧峰会发表的亚欧投资促进活动计划将进一步推动对亚洲投资的发展^③。

在东亚作为国际投资东道国地位迅速崛起的同时,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开始崛起在国际舞台上。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猛增,到 1994 年 6 月,除日本以外的 10 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达 3466 亿美元,超过了美欧 6 个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而使东亚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贸易摩擦,更多地占领国外市场,并从那里获取原料、经济信息和高新技术,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日益增多。如果说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和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亚太地区第一波国际直接投资浪潮的话,那么 80 年代中期掀起的则是亚洲“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国家、中国大陆和越南等印支地区转移的第二波国际直接投资浪潮。90 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开始参与对外直接投资。1980 年,中国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 1.48 亿美元,1994 年增至 601.56 亿美元,增长 405.5 倍,是东亚发展中地区头号对外直接投资者,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瑞士和意大利之后居第 10 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大户。1980 年,中国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仅为 0.97 亿美元,到 1994 年已增至 208.43 亿美元,增长 213 倍多,是东亚发展中地区位居第二的对外直接投资大户,在市场经济体系排 14 位。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 60 年代后期,1980 年该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累计余额 1.42 亿美元,1994 年增至 76.28 亿美元,增长了近 53 倍。同期内,新加坡由 6.52 亿美元增至 68.89 亿美元,增长 9.6 倍;马来西亚由 4.14 亿美元增至 62.69 亿美元,增长 14 倍。泰国由 1980 年的 0.13 亿美元增至 11.11 亿美元,增长了近 84.5 倍^④。到 1995 年,亚洲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430 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 90%。1993—1994 年,亚洲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约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 2/3,亚洲国家(地区)在促进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走出 1991—1992 年衰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⑤。

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东亚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1970 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金额的

①张文祥:《亚太经济研究》,海洋出版社 2000 年,第 7 页。

②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5—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1995, p. 45.

③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greements*, New York:1996, p. 52.

④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greements*, p. 48.

⑤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greements*, p. 52.

44.2%；欧洲的英、德、法、荷四国合计占45.1%；日本仅占0.9%^①。东亚发展中地区所占份额微乎其微。199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世界的份额降至25.84%，西欧占50.70%，日本上升为12.15%，东亚为2.29%^②。而到200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世界的份额进一步下降为20.82%，西欧上升为56.68%，东亚占世界的份额进一步上升为9.51%，日本锐降为4.70%^③。

随着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增强和国际投资地位的提高，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开始在东亚地区与日本展开激烈的投资角逐。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加快了对亚洲的投资步伐，尤其是对东盟的投资增幅更大。从日本大藏省公布资料可以看出，日本对东盟五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直接投资，逐年大幅度增加：1986年为8.5亿美元，1987年为15亿美元，1988年为27亿美元，1989年61亿美元^④。据《洛杉矶时报》1991年12月16日报道，在1986至1990年间美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长22%，达123亿美元。而同一时期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增加了近一倍，达260亿美元^⑤。至此，日本在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方面，已超过美国跃居第一位。

然而，9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国家对外投资能力大幅度提高，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初，韩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42.8%集中在东亚地区，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约占24.1%。中国台湾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3.75%，对美国的投资约占18.12%。中国香港境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依次为中国大陆、美国和东盟。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依次为东盟、中国和美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则主要在东盟和中国从事跨国经营。到1995年，马来西亚和泰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60%多流向了亚洲其它国家；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约4/5流向了中国大陆；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相当大的部分分布在其它亚洲国家，特别是东盟成员国和中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0%留在亚洲地区^⑥。

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在积极推进自身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同时，大举向东盟、中国及越南等国进行投资。9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地区)已取代日本和美国成为东盟的最大投资者^⑦。1990年，“四小龙”、日本、美国对东盟(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直接投资额分别是148亿美元、68亿美元和15亿美元^⑧。“四小龙”对这四国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日美两国的总和，在东盟投资市场上“四小龙”已成为日本及美国资本的主要竞争对手。1992年，东亚地区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5国所吸收的外资90.1%来自亚太地区，主要是“四小龙”(占70.9%)、日本(占10.2%)和美国(8%)，其余来自欧洲(4.4%)和其他地区(5.6%)^⑨。

在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竞争中，日本大大逊色于“四小龙”等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1989年6月中国发生政治风波，欧美国家迅速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然而日本无视欧美国家的意向，正常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日本对中国的民间投资额，从1989年的4.07亿美元微增到1990年5.2亿美元。然而，与“四小龙”相比，日本对华投资之少让人吃惊。早在1987—1988年，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对中国投资已占中国接受外资的66%^⑩。到1992年，“四小龙”与日本的对华民间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是90.88亿美元和7.48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2倍。其中，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就相当于日本的1.4倍，香港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是日本的10.6倍^⑪。199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32.1284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八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合计为258.9344亿

① 日本经济中心：《2000年的国际经济与日本》，时事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② 根据“Annex table 4. FDI outward stock, by home region and economy, 1980, 1985, 1990, 1994 and 1995”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阅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greements*, pp. 245~247.

③ 根据“Annex table B. 4. FDI outward stock, by home region and economy, 1980, 1985, 1990, 1995, 1999 and 2000”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阅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Promoting Linkages*, New York, 2001, pp. 307~311.

④ 吴学文、俞宜国、张威：《日本金融政策与金融大国》，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⑤ 吴学文、俞宜国、张威：《日本金融政策与金融大国》，第185~186页。

⑥ 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greements*, pp. 52~53.

⑦ 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和远东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第28~29页。

⑧ 林华生：《亚洲“四极”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3页。

⑨ 张文祥：《亚太经济研究》，第7页。

⑩ UNCT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2—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 New York, 1992, p. 25.

⑪ 林华生：《亚洲“四极”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15页。

美元,占 59.82%,日本为 30.6089 亿美元,仅占 7.08%;到 2000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493.5627 亿美元,其中来自东亚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合计为 236.0391 亿美元,占 47.87%,日本为 30.6117 亿美元,仅占 6.2%^①。

随着东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增强和相互投资的急剧增加,日本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的投资地位急剧下降,其中台湾吸收日本的直接投资占总额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36.4%下降到 2000 年的 9.6%,韩国由 29.3%下降到 15.6%,泰国由 43.2%下降到 24.5%,印尼由 23.9%下降到 12.7%,马来西亚由 1991 年的 36.8%下降到 2000 年的 14%,菲律宾由 46.2%下降到 7.2%^②。此外,在国际市场上,为占领市场和获取高新技术,东亚新兴经济体也正在加紧向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东欧、独联体国家和中南美洲国家渗透。90 年代上半期,韩国公司到欧洲投资建厂的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994 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约为 3 亿美元^③。东亚新兴经济体向美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对外投资扩张,无疑将给日本的国际投资带来更加广泛的挑战。

三、东亚国际金融地位的提升对日本金融的冲击

90 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东亚的国际金融地位迅速崛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们的发展都以金融业的发展为先导,都有高度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金融管理体制,都有发达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银行的整体实力位居前列。其中香港 1994 年银行资产占 GDP 的 195%,股票市场资本总量占 GDP 的 205%;新加坡 1994 年银行资产占 GDP 的 186%,股票市场资本总量占 GDP 的 217%^④。从所汇集的外国银行数量来看,1994 年 12 月,香港共有 243 家银行,其中有 148 家在国外注册的银行。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中,香港排在伦敦和纽约之后,居新加坡和日本之前。从这一指标来看,香港在全球排第 3 位,是全球第 3 大国际银行中心^⑤。就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等质量指标来看,新加坡、香港的银行均高于亚洲其它银行。在香港,进入世界 1000 家大银行的有 22 家,新加坡有 5 家。香港与新加坡之间为争夺亚洲乃至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新加坡组建了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日经 225 股票期权等新交易品种,吸引了一大批国际金融机构从日本移往新加坡。1998 年新加坡推出香港恒生指数期货业务,再次企图争夺这个市场的国际客户。

90 年代以来,日本东京在外汇交易规模、交易货币品种和交易结构上不仅同伦敦、纽约明显拉开了距离,而且也逊色于亚洲的另外两个外汇交易市场——香港和新加坡。据国际清算银行调查,从交易规模来看,1989 年 4 月到 1998 年 4 月,东京外汇市场的单个营业日的交易量由 1989 年 4 月的 1110 亿美元上升为 1992 年 4 月的 1200 亿美元,增长 8%,再上升到 1995 年 4 月的 1610 亿美元,增长率 34%,而到 1998 年 4 月居然下降 8%,回落到 1490 亿美元。同期新加坡市场从 1989 年 4 月的 550 亿美元上升到 1992 年 4 月的 736 亿美元,1995 年 4 月的 1054 亿美元,再上升到 1998 年 4 月的 1390 亿美元,分别增长 35%、43%和 32%;香港市场从 1989 年 4 月到 1995 年 4 月,由 490 亿美元上升到 1992 年 4 月的 600 亿以及 1995 年 4 月的 900 亿美元,分别增长 33%和 50%^⑥。显然,东京市场交易规模的增长幅度落后于新加坡和香港。高度自由的香港和新加坡金融市场在外汇交易业务方面逐渐取代日本,甚至在某些领域的影响已经开始超过东京,从而使东京金融市场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⑦。由此可见,香港和新加坡国际金融地位的崛起,对日本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

①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6 年度数据目录》,“16—15 实际利用外资额(按国别、地区分)”;
《2002 年统计年鉴》,“17—15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和其他投资额(按国别、地区分)”,载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②Tim Callen & Warwick J. McKibbin. “Policies and Prospects in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able 2: Share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Host Country”, *IMF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01, p. 7.

③杜方利:《东亚经济的崛起》,远东出版社 1998 年,第 19~20 页。

④杜方利:《东亚经济的崛起》,第 104 页。

⑤胡坚:《欣欣向荣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10 页。

⑥田中景:《日本经济:过去·现状·未来》,第 88 页。

⑦成思危:《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 年,第 148 页。

除了面对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挑战以外,日本在东亚还面临中国金融崛起的挑战。90年代以来,上海凭借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主要的金融中心,许多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纷纷落户上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进程的展开,上海必将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乃至全球性金融中心,人民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与日俱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东亚的国际金融地位,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国际金融竞争。

四、余 论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迅速崛起,东亚国家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国际金融方面对日本经济构成严峻挑战。就对外贸易来说,随着东亚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从而导致日本对外出口下降,国内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企业不得不削减设备投资。而企业进一步削减设备投资,更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导致库存大量积压乃至企业大量倒闭。与此同时,由于东亚国家制造和出口的许多产品价廉物美,导致东亚各国产品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市场,在东亚进口产品的冲击下日本不少企业陷入破产倒闭境地,就业人数大幅减少。由于日本从东亚进口的食品、服装、杂货等生活消费品价格十分便宜,从而对日本的价格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出现所谓的“价格破坏”现象。尽管“价格破坏”有利于提高日本国民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但是其负面效应不可忽视。“价格破坏”带来的价格紧缩和土地、股票等资产紧缩一起共同造成了90年代后期日本的通货紧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经济衰退。

就对外投资来说,战后以来,对外投资在促进日本经济崛起方面至少发挥了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对外投资确保了日本所需原燃材料的稳定供应;对外投资有利于日本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缓和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摩擦,“变相”实现了对外出口的扩大;对外投资还有利于日本利用国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增强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①。然而,随着东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提高,日本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的投资地位急剧下降。东亚新兴经济体向美欧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对外投资扩张,也给日本的国际投资带来更加广泛的挑战。因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发挥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就国际金融来说,国际金融中心是大型金融机构集中的场所,是各种金融证券交易所林立的地方,是跨国金融借贷融资活动大规模发生的地方。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可为有关国家带来丰厚外汇收入和便利的外来融资^②,因而,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成为东亚各国和地区竞相角逐的对象。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国际金融地位的崛起,日本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亚产业竞争力的崛起、对外投资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金融地位的提升,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等方面,对日本经济形成全方位挑战。因而,东亚经济崛起对于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自强,湘潭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 湘潭 411105。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BB376);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1A126);湘潭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责任编辑:桂 莉

①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6~51页。

②王国刚:《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页。